

破题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下)

垃圾处理,从公益到生意

引入社会资本

“不能忽略的是,按照目前北京市针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生产者收取的处理费用计算,成本端费用是相对高昂的,还是需要通过引入经济手段缓解压力。”李如刚在采访中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据了解,除去前端和终端人工成本,目前针对北京市厨余垃圾及其他垃圾生产主体回收价格分别为100元/吨和300元/吨,而后端处理厨余垃圾核算成本平均已达到330元/吨。

“在现有国家财政单一投资体制下,城市垃圾处理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方式多元化格局。”同济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李恺撰文指出,在城市垃圾处理设施投资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从单一由政府投资行为转向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投资建设,势在必行。

“对于修建垃圾处理厂来说,政府已在逐渐采取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市城管委设施处副处长蔡华帅说。近年来,PPP项目融资模式在全国各大省市遍地开花。一般来说,各区根据自身垃圾处理需求授权特定企业建设处理厂,通过较为系统的项目评估,企业将建成的处理厂交由政府监督和管控。就目前而言,全市垃圾处理厂PPP项目中,利用BOO(建设-经营-转让)模式修建垃圾处理厂仍是主流。”市城管委设施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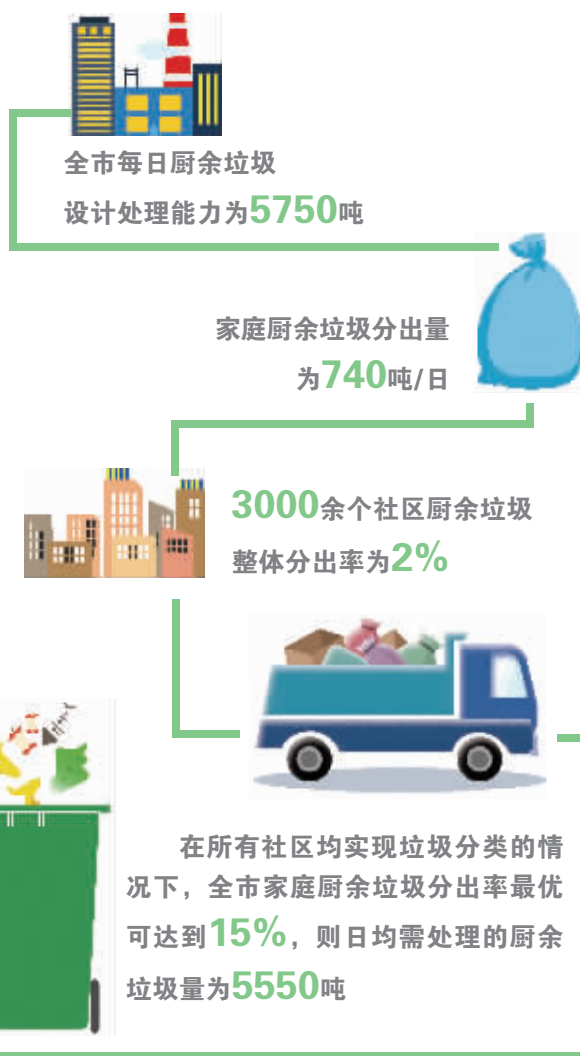
相较于BOO(建设-拥有一经营)模式和BOT(建设-移交-运营)模式,BOT模式能够帮助政府在建设垃圾处理厂初期即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节省建设成本。企业方则在建成厨余垃圾处理厂后,在处理项目带来的长期回报中受益,填补在建设初期的资金投入

厨余垃圾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中之重。“5月以来,全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达到740吨,较4月环比增长159%;餐饮单位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1263吨,环比增长98%。”《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地满月之际,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透露。眼下,随着全市厨余垃圾处理量攀升,市城管委称已在酝酿新一批厨余垃圾处理厂建设规划。不过,厨余垃圾处理成本相对高昂,在处理设施大规模增长并运营的情况下,仅凭财政投入,未免有些捉襟见肘。“公益”能否成为“生意”?如何将市场化的力量引入垃圾处理的末端?这将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人和处理成本。

掘金点在哪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注资垃圾分类对企业而言,一方面是社会责任感带动,而政府也会进行相应补贴。但企业注资后如何实现盈利,则仍需完善盈利渠道,补齐这



条垃圾分类链条的“最后一公里”。

走访过程中,不同厨余垃圾处理厂后端处理盈利点“因木而异”。例如,海淀区大工村厨余垃圾处理厂厨余垃圾资源化水平可达到95%,经过处理后,无害化率可达到100%。处理厂车间外的空地上堆叠着上百袋处理过后生成的土壤调理剂。

这些土壤调理剂技术提供方北京嘉博文

编者按:垃圾处理能力考验城市治理水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落地满月,垃圾分类步入实操,减量之下,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如何?在过去半月间,北京商报记者相继探访了海淀区大工村厨余垃圾处理厂、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等后端处理场所,了解垃圾处理的全流程。近期,北京商报拟分上下两篇推出系列报道——破题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分别聚焦后端处理的流程、产业化水平等关键节点。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曹小刚告诉记者,目前该厂产出的土壤调理剂已销往全国。“这些按袋装的土壤调理剂可被用于山东烟台苹果种植园土壤改良、湖北高标准农田建设或东北黑土地建设等。”而鲁家山厨余垃圾处理厂相关负责人赵晓东则介绍,该厂经处理分离出的粗油脂将被运向河北统一提纯生物柴油。

据了解,按照每400吨厨余垃圾可产出60-70吨土壤调理剂折算,大工村厨余垃圾处理厂每年可产出2万吨土壤调理剂。但曹小刚也坦言,环境处理行业本身不是暴利行业。目前来看,企业依然需要政府进行部分补贴以保障收支平衡。

而对于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而言,其通过垃圾处理产出的产品大多在园区内自行循环;赵晓东则表示,就单个垃圾处理厂来看,其实产出的粗油脂量非常少,更多情况下,还是要将粗油脂统一送到河北对接厂家进行进一步的规模提纯,而不是直接通过生物柴油创造经济效益。

分类再细化

“垃圾分类的难点主要就在厨余垃圾的处理。但需要理性思考的是,垃圾分类在全国大面积推行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肥料?”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厨余垃圾中存在大量熟食,盐分较大,天然不适于做成肥料,而特殊处理的过程或将进一步抬高后端成本。

“对于企业来说,技术不断演进,垃圾处理成本会逐渐降低,但需要时间。”曹小刚进一步表示;“我们的办法是,通过多样化后端产品的种类,探索油脂、土壤调理剂等多条销售路径;另一方面,以土壤调理剂为例,大批量、无差别输出是很难实现盈利的。于是,我们提供的是因地制宜的服务和技术指导。其

实就是需求端土地的不同需求,像中医把脉一样,进行调理剂的成分配比,有针对性地输出产品,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目前,在公司的“治疗”方案中,分门别类列举出重金属污染土壤、贫瘠土壤、结构障碍土壤、重茬障碍土壤和酸化、盐碱化土壤等土壤类型。针对这些问题土壤,其官网展出的调理剂也多达十余种,例如腐植酸型抗重茬菌剂(草莓专用)、地还童有机源土壤调理剂等。

徐海云提出一个有意思的思考: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何调和刺激社会消费和实现垃圾减量之间的矛盾?毕竟,消费繁荣势必带来垃圾的增加。此外,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或将意味着将过剩部分运去焚烧发电或填埋,二次处理对政府而言又是一次成本消耗。”

徐海云建议,对于易变质的熟食可酌情分类,可更多侧重资源化利用,例如玉米梗之类的生食。未来要注意的是,垃圾分类不宜因“资源化利用”而偏废其卫生职能。即便是在德国慕尼黑或奥地利维也纳等地区,做到最好的情况下,厨余垃圾中熟食分出率也仅在25%。适当控制其处理量确实能够帮助节约一些处理成本,也有助于市场有效消化后端产品。”

在李恺看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效益更多为社会效益,而非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自身的现金流目前并不能保证BOT融资对现金流的要求,其收入来源还是依靠政府补贴和一部分售电收入,且常常只能维持设施的运营成本,这样的状况极大地限制了BOT的进入。”因此,开辟新的现金流收入,才能保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BOT融资的顺利进行,而收取垃圾处理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X 西街观察
ijie observation

对地摊经济不要高期望,也不要拉抽屉

韩哲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万户摆地摊。

在保就业和促消费的强大政策背景下,又经总理背书,地摊经济脱颖而出,上海等27个城市明确鼓励。与此同时,地摊经济概念在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五菱汽车“躺赢”,锅碗瓢盆,鸡犬升天,短期炒作明显。

媒体很兴奋,段子手也很高产。地摊经济不用掉书袋,老百姓一听就懂,成本低,易上手。城市的烟火气,不限于地摊,可以延展到夜市,供需两便,解燃眉之急,赞成者居多。

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之策。持续数月的疫情,有人失业,有人收入下降,越是底层劳动者,承受的压力越大。地摊经济,为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提供机会,为囊中羞涩的消费者提供场景,大家一起“共克时艰”。这个时候,不要执于“面子”,而是要以“里子”为重。什么是里子?就业和消费。

地摊经济,贵在实事求是。这种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形态,早已式微。这个倒不是城管的“功劳”,而是富足起来的国人,早已消费升级,从便利店到大卖场再到生鲜超市,对地摊都是降维打击。移动互联网的平台思维更是横扫一切,即使是在农村地区,电商的不断下沉也使其慢慢向线上转移。

因此,鼓励地摊经济,更多是政策释放的柔软身段,是千方百计保就业和促消费的体现。将地摊经济的选择

权交给地方和市场,不一味“先进”,允许“落后”;不一味“有序”,允许“散漫”。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分层足够多,容得下地摊经济的市场空间。6亿人月收入1千元,这就是地摊的经济基础。哪怕是北上广深,也必然有市场洼地。

也正是如此,我们对地摊经济不应神化和泛化。尽管地摊经济有一种诗意的浪漫,仿佛一句烟火气就让人重拾起城市的温度,那不是现实。

另一方面,对地摊经济,既不要抱过高期望,也不要拉抽屉。从一开始,各地就要设计好政策规范,以及退出机制,稳定预期。地摊成本再低,对个人而言,也是不菲。经济不好的时候,一拥而上发展地摊经济;当经济好转的时候,就觉得地摊经济碍眼,不高大上,这是最不可取的功利主义,也是典型的懒政思维。

如上所说,地摊经济是“小民经济”“小店经济”,虽然既不规模也不互联网,但存在就有其合理之处。发展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同层次的供给和需求,都能够得到匹配,都各得其乐,岂不快哉。政府更多应该顺势而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己任。

城市也好,市场也好,都是在漫长的积累和演化中,形成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高大上多一些还是烟火气多一些,交给无形之手。

北京拟修订20项公共卫生领域法规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6月4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有关情况和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计划于2020-2021年制定修改20项公共卫生领域地方性法规,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传染病防治条例等。同时,在本次会议期间,根据市人大代表在代会上提出的法规案,人大城建环委建议,将《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条例》列入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计划。

“为了更好地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发展需要,我们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结合五年立法规划项目安排,按照衔接配套、健全体系、急用优先”的工作原则,制定了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计划利用两年时间,全面加强和完善本市公共卫生相关地方性法规制度建设。”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主任王荣梅介绍。

根据工作计划,拟在2020-2021年进行审议的项目共20件,具体包括: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传染病防治条例、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献血条例、中医药条例,修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实施红十字会法办法,建立健全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规制度;制定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物业管理条例、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订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总结固化群防群治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修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动物防疫条

例、实施种子法办法,健全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做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制定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废止食品安全条例,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制定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条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修改市容环境卫生条例,治理公共卫生环境,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污染源治理。

此外,拟进一步评估、适时制定或修改的项目包括:一是根据疫情防控和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需要,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精神卫生条例、实施母婴保健法办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法规,开展立法评估,适时进行修改。二是围绕慈善、捐赠、社会救助、医疗保障和医疗基金监管等方面开展立法调研。三是根据首都公共卫生领域深化改革发展的需要,紧跟上位法制定、修改和法律实施的新要求,需要制定、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的,适时增补新的立法项目。

同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市人大相关专委会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根据市人大代表在代会上提出的法规案,人大城建环委建议,将《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条例》列入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计划。

市人大城建环委主任委员郝志兰介绍,目前,北京市共有地面公交运营企业15家,运营车辆2.8万辆,运营线路总长度45371.2公里,2019年完成客运量35.67亿人次,公交车辆规模、线路数量和客运量均位

列世界各大城市之首。

在规划建设方面,本市目前尚未专门针对地面公交编制专项规划,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出租汽车、慢行系统等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不充分,接驳设施规划建设不同步,影响公交系统整体运行效率和作用发挥。

在设施用地方面,按照相关行业标准计算,目前本市公交场站用地还存在一定缺口,现状674处公交场站中临时场站占到70.5%,对公交稳定运行造成一定影响;在路权分配方面,全市已规划的952公里公交车道中,存在路口连续性交叉、断点多等情况,速度优势不能充分体现。

对此,法规案建议,针对公交设施用地及综合利用、公交线网规划、接驳设施一体化设计建设,以及公交专用道施划等方面,对相关政策规定予以细化。

在运营服务方面,本市尚未出台有关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营服务标准,无法有针对性地对企业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进而与奖惩机制挂钩。

此外,缺乏对公交参与人权利义务的细化规定,公交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承担的义务和法律责任不明确,乘客票务违规及其他不文明乘车行为缺乏处罚依据和应对措施,抢夺方向盘等妨碍公交运行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时有发生,安全风险防控和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有待进一步强化。对此,法规案建议,约束乘客的票务违规及其他不文明乘车行为,研究将企业的违规经营行为和乘客严重扰乱乘车秩序、危害公交运营安全等行为纳入信用管理。